

日本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王新生

内容提要 尽管中国学术界的日本政治研究论著较少,但也出现了利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的优秀作品,诸如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态分析等;日本学术界将政治学作为了解政治组织形式、对其进行解释的一门独立学科。以本国政治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历了批判政治学、风土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多元主义政治、计量分析方法等战后各个阶段。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阐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后利用特定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政治体制或政治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是今后为提高日本政治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研究 政治 比较政治学 政治发展

本文主要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分析战后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即第一部分评述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第二部分论述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第三部分阐述如何通过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界定中日两国政治发展阶段并在其基础上研究日本政治。

*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 100871)

一、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

从体制上,中国学术界研究日本政治人员基本上从属政府的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研究所、高等院校等。1963年12月15日,中共外事小组和中宣部提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建议新建或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同时在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外国机构,因而各地的日本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例如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部、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日本经济研究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等机构均成立于1964年或1965年。但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研究机构均处于瘫痪状态,其研究成果也难见踪影,似乎只有复旦大学在1977年出版了涉及日本政治的《日本政府机构》。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新的大型日本研究机构,特别是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1988年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后来成为实体的日本研究院)、1990年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了日本经济学会(1978年)、中国日本史学会(1980年)、中华日本学会(1990年)等大型学术团体。但在全国总数约110个左右的日本研究机构中,高等院校所属人员约占70%,而且大多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学、经济、历史等,研究日本政治者较少,例如在所有研究机构的大约1000名研究人员中,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的人员约占12%。事实上,以“日本政治”为主体专业方向的研究者,人数规模应在20名左右,在日本研究者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①因此,研究日本政治的论著较少,例如从1979年到1993年国内出版探讨日本的书籍3157本,其中仅有226本以日本政治为研究对象。从1949年10月1日到1993年3月1日发表的1.9465万篇日本研究文章中,涉及日本政治的文章只有1340篇。甚至有这样的观点:“用今天标准看,赫赤、谭健的《日本政治概况》^②只是一本普及型教材,但却标志着学术界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从总体的‘日本研究’中独立出来。”^③尽管1993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日本政局进入长期动荡期,

^① 徐万胜:《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30年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6页。

^② 赫赤、谭健:《日本政治概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北石:《战后6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日本学论坛》2005年第1期。

中国研究日本政治的人员和成果有所增加,但细分起来,涉及日本外交的文章依然较多。即使在权威性专业刊物《日本学刊》1998年到2008年发表的所有文章中,综述为64篇,政治外交为235篇,经济为207篇,社会文化为181篇。在政治外交文章中,研究外交的149篇,研究政治的只有47篇。^①从2000年到2014年间,《日本学刊》上发表的日本政治类论文比重仅占全部论文的9%左右。^②

尽管日本政治研究的论著较少,而且其中时评性、介绍性、资料性的成果居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不少利用政治学理论和政治研究方法对日本政治进行研究的论著,首先是政治过程论的运用。从政治学理论上讲,政治过程论属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将政治生活看作是一个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该方法反对把政治制度当作政治分析的核心内容,因而是一种动态的政治分析方法,例如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③就是利用政治过程论分析日本政治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按照政治过程的顺序,依次探讨了选民的投票行动、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方式、行政官僚起草法案及执政党的审议、在野党如何利用国会实现自己代表的利益要求、行政机构的行政指导、独特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销售税的政治过程等。

从方法论上看,首先是多元主义政治学。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社会,民主政治应该是多元主体通过“多元竞争”(讨价还价),达成“价值趋中”(妥协)的政治。传统政治民主化理论关注宪法上的分权制衡与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忽视了社会上的多元制衡机制的作用,而后者才是实现民主的关键环节。只有两种(政府与社会)权力制衡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民主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多元主义民主的核心是决策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决策过程的多元竞争和妥协性。许多中国学者的论文运用了该方法,例如,郭定平在《论战后日本政治多元化》^④一文中认为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随着占领时期的民主化改革,政治权力开始在不同的组织和个人中进行重新分配,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许多社会和经济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过程,这些团体和组织利

① 郭定平:《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② 吴怀中:《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30年综述》,《日本学刊》2015年增刊,第39页。

③ 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④ 郭定平:《论战后日本政治多元化》,《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

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影响决策过程,在社会和权力之间形成了重要的制衡机制。此外,还有张云的《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①蔡亮的《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简论“农协”在反 TPP 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②田凯及邵建国的《日本财界的政治影响力分析:以日本 TPP 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③等论文。

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研究政治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注重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过程,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价值分配问题。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提出,但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理论与现实》^④显然属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不仅郑励志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该书“展现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而且构成该书核心部分的第二部分使用的标题就是“结构·功能”。由于作者认为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因而在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把握和研究其政党政治,但战前部分不仅篇幅比较少,而且理论色彩也较淡,只是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脆弱和保守归结为:一方面与日本政党本身天生的保守性和妥协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与政治的客观环境有关。对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特别是“55年体制”,作者分别在“政党支配与社会统合”“保守主义与国家战略”“政策决定与政党能力”“利益政治与长期政权”“野党牵制与政策平衡”的标题下,对战后日本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政党政治背景进行了较为精彩的理论性分析,在最后的“问题·挑战”部分概括性地分析了“民主贫困与政治腐败”、“领导危机与结构转换”等。

尽管王新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⑤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日本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也属于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因为该书强调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运用的形式,即政治权力配置和运用的形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行政官僚、以立法机构为舞台的

① 张云:《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② 蔡亮:《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简论“农协”在反 TPP 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③ 田凯、邵建国:《日本财界的政治影响力分析:以日本 TPP 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理论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016年再版时改为《日本政党政治》。

⑤ 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政党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等按照制度上的规定或约定俗成惯例行使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力,以保护或者扩大自己的利益及权限。从形式上看,这些政治主体或政治行为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按特定的结构组成一个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有规则地运转着,同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说来,以70年代为界,在此以前的“55年体制”带有竞争性政党政治、官僚主导决策过程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性利益集团发挥较强政治影响力等特征,对经济发展以积极作用为主;70年代以后的“55年体制”发生较大变化,其特征转化为协调性政党政治、执政党与行政官僚相互利用、消费性利益集团发挥较大政治影响力等,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逐渐增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经济的现代化。

新制度主义方法也运用在日本政治研究中。该研究方法认为,传统的制度主义过于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而且对制度的研究过于注重描述性,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新制度主义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量化的研究方法。^① 魏晓阳的《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②和郭定平的《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③均采用新制度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前者将制度分为纸上的制度和实际操作中的制度,进而探讨纸上制度向实际制度的转化,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后者认为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政治行政一系列改革推动了日本模式的转化,但也引发了转型危机、政局动荡、政策扭曲、官僚腐败以及政官关系混乱等问题,增加了转型的难度。

另外,周杰的《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尝试利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然后运用这一框架寻找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各种因素,说明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和制度演化轨迹,然后再检验改革结果的产出和效果,最后总结出混合选举制度改革的日本模式。具体地说,历史学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和结构相互影响,行为者很难计算出最佳策略,制度对于个体行为与选择具有重要的限制作用,同时也受集体选择的结果所左右,制度改革是结构与行为的互动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作者首先以

① 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② 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郭定平:《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制度和社会背景分析作为选举制度改革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尝试将这些可能的结构性因素加以理论性的结合,描述其在选举制度改革过程中的解释意义,以建构一套解释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说法;接下来,作者分析了选举制度改革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制度变迁的轨迹以及最终结果,同时说明政党、政治家、利益团体以及大众媒体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及其作用;最后作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评估新选举制度产生的政治效果和影响,即运用选举制度改革后历次大选的实证数据,就制度变革与选举结果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政治生态分析方法也运用到对日本政治的分析中,张伯玉在《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①提出生态分析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生态分析被用于政治学研究主要是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政治生态学的特点在于试图测定不同的环境对于特征相似的个人或团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该书将日本政党制度这一生态单位作为生态分析中的生命系统,将政党制度产生和变化发展的政治生态条件作为其环境系统,通过分析政党制度与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在关联及相互作用,揭示日本政党制度产生并得以发展的依据,分析政治生态环境系统变化对日本政党制度提出的特殊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日本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向。把握政治生态系统的特质是理解日本政党制度从何而来及其特征何以形成的关键,而审视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则是明确日本政党制度向何处去的基础。

二、日本的日本政治研究

在日本,政治学是法学部的一个学科,很少有大学将其独立出来,但政治学涵盖的范围较广,例如,1948年成立、目前拥有1800多名会员的“日本政治学会”中有现代政治过程研究会、日本政治过程研究会、现代政治学研究会、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会、现代地域政治研究会、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欧美政治研究会、临床政治学会、批判政治研究会、性别与政治研究会等16个分会,分属政治过程、政治理论、政治史、比较政治等研究方向。根据学会杂志《日本政治学会年报政治学》创刊号的解说,该学会是在“清除原来制约政治学研究自由的政治体制、以实现永久和平及建设文化国家为目标的新体制形成背景下,由相关领域各种学会组成的政治学研究者全国性组织”,因而自成立以来一直

^① 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起到日本政治学研究中心的作用。

日本学术界将政治学作为了解政治组织形式、对其进行解释的一门独立学科并以本国政治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且最初是建立在对战前日本政治结构、国民政治意识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基础之上,代表作为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石田雄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和《近代政治结构研究》、神岛二郎的《近代日本的精神结构》等。丸山的著作上、下卷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出版,为战后初期撰写的论文汇集成册,其中“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等论文,均以战前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模式为对象,结合战后现实政治问题,对战前的国家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特别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在另外一篇名为《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论文中,丸山认为政治学的价值在于以研究者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和价值判断为媒介的社会需求,也就是说,课题选择不是学术研究自律的活动,而是在同外界的关系中形成;石田雄在《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研究》中认为,随着近代化的迅速进展,传统的秩序发生动摇,专制主义的、警察式的对居民控制得到加强,传统秩序的自律性降低,日益接近官僚国家。在方法论上,石田将明治国家政治结构分成三个层次,即作为政治结构“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地方自治机构及政党等中间性媒介机构、顶端的中央政府机构,并对不同层次的政治结构采取了不同的实证方法,然后加以组合;神岛从直接研究普通国民的生活意识角度出发,以构成行动的真正动机、动力的“感性价值”为分析对象。他在《近代日本的精神结构》中指出,促进日本近代化的是日本前近代的“家族”意识,这种“家族”意识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为国家所代替,并在神道教的推动下,热衷于支持法西斯主义运动。

把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研究称为批判政治学,不仅因为上述三位学者对战前政治体制及其意识进行批判,而且以辻清明为中心的其他政治学者对战后政治体制也持批判态度,其背景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导致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政治学者担心战前保守势力的回归。日本政治学会在1953年出版学会年报专辑《战后日本政治过程》,后经过增补修正,在1958年以《现代日本政治过程》为题重新出版。尽管该书是以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年轻政治学者为中心撰写的论文构成,但基本观点来自辻清明的《日本官僚制研究》。辻清明认为战后日本官僚制特点为前近代、半封建性、后进步性,是战前天皇制的连续。具体说来,由于美国的占领政策是通过日本官僚制而实施的“间接统治政策”,对

官僚制“中立性”的幻想已渗透到广大国民中间,加之议会和政党这些应当取代官僚制的新政治主体尚未成熟等原因,官僚制的统治得以保留下来,与战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大体上分为两个群体,即埋头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政治进行分析的学院式研究与尚未上升为系统理论的经验性研究,但后者的影响显然大于前者。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许多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日本政治学领域,诸如大众社会论、压力集团论、现代化学说、权力精英理论及政治系统论、政治行为科学、政治过程论、政治决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学、计量政治学、数理政治学等政治学理论。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学者尝试性地利用这些理论对日本政治进行分析,1960年日本政治学会出版了《日本的压力集团》专辑,1967年该会又出版了《现代日本的政党与官僚》专辑,刊登的论文基本以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官僚优势论为基本思路研究政党、国会和利益集团,不仅是研究对象扩大,而且分析的重点也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的政治,把官僚的熟练专业能力与政党的无力化、国会功能的下降对应起来,从而使官僚优势的基础从战前的特权性转变为专业性。另外,田口富久治的《社会集团的政治功能》、上林良一的《压力集团论》、筱原一的《现代政治力学》等著作深化了对利益集团与政党、官僚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力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性政治研究,大多表现为以独特的方法分析日本独特的政治组织、结构或政治意识,带有浓厚的风土政治学色彩。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曾指出:“为数不多的几位政治学家创立了土生土长的政治理论,人们按照这些理论去认识日本的政治制度比用从美国和欧洲引进的理论可能要清楚得多”。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京极纯一的《政治意识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与政治学》及《日本政治》、^①升味准之辅的《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筱原一的《日本的政治风土》、三宅一郎的《不同层次选举的投票行动研究》、福井弘治的《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等。

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革新政党控制的地方自治体迅速增加,因而地方自治体及市民运动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日本政治整体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例如,日本政治学会在1979年出版了题为《55年体制的形成与崩溃》专辑,大部分论文是关于地方自治及市民参与政治

^① 京极纯一:《日本政治》,杨晶、李建华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国内公司1992年版。

的精辟分析。另外,筱原一的《文化变容与地方政治课题》、辻清明的《处于歧路的地方选举潮》及《日本的地方自治》、山川雄巳的《自治体的信息管理与决策》、古城利明的《地方政治的社会学》、坂田期雄的《地方制度的结构与实况》、古居寿治的《地方公共团体》等著作,均对地方政治的体制、结构、职能、发展趋势进行了严谨的探讨和理论性研究。

除上述地方自治体政治的研究外,研究市民运动和城市化基础上的市民政治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十分兴盛,例如,神岛二郎的《民心政治学》、筱原一的《市民参与政治》、足立忠夫的《现代社会与市民》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松下圭一、高岛通敏及其研究成果。松下圭一在 1973 年编辑出版了 12 卷本的《讲座:现代都市政策》,该丛书是在自治体职员、市民运动领导者参与下完成的系列论述政策科学的力作,研究对象是向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社会过渡的日本社会,并提倡以都市问题为中心形成实践性的政策科学,但其政策科学带有浓厚的规范性、制度性、图式化色彩,并未阐明与传统市民不同的新中间阶层在日本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岛通敏不仅是研究市民运动的高产政治学家,仅在 70 年代就出版了《政治的逻辑与市民》、《自由与政治》、《新社会科学入门》、《现代日本政治:1972—1977》、《现代日本的选举与政党》等著作,而且还是市民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及其分析,不仅阐明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市民运动的发展轨迹及其与日本政治的关系,而且从市民的角度出发批判了现实政治与现代社会科学。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各政治主体为保护自己权利或利益而相互之间竞争激烈,美国学术界出版了不少分析日本政治的书籍、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政治学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研究方法,以及 80 年代“协调主义”学说引进日本等原因,日本学术界出现“日本政治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岳秀夫、村松岐夫和猪口孝三位政治学者,大岳在其撰写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和《日本政治的争论焦点》中,运用专题研究方法分析了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争论焦点以及典型事例,在微观研究与对体制的宏观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多元主义性质;村松通过以官僚、政治家为对象的数据分析,驳斥“官僚优势论”,并进而探讨了“一党优势”下自民党与行政官僚关系为核心的决策系统的特征,将其概括为“图式化多元主义”,其含义为“保革对立”在日本还存在,行政的作用依旧很大,在决策过程中行政官僚变成了一个回转轴;猪口也持多元主义观点,但认为官僚主导的大局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因而将日本

政治系统看作是“官僚主导大众包揽型多元主义”。上述三人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利维坦》专业学术刊物,努力将日本政治研究乃至日本政治学研究国际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以猪口孝为首编纂出版20卷本《现代政治丛书》,各卷均在分析当代世界相关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日本政治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性或比较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多元主义政治学方面具有代表性日本政治研究著作还有内田满的《政党政治的政治学》、草野厚的《日美柑橘贸易交涉》、村川一郎的《日本政策决定过程》、渡边昭夫的《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间场寿一等人的《日本政治分析》、阿部齐的《现代政治与政治学》、石川真澄等人的《自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构》、猪口孝与岩井奉信的《族议员研究》、佐藤诚三郎与松崎哲久的《自民党政权》、新藤宗幸的《行政改革与现代政治》、中野实主编的《日本型决策过程的变化》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结束、泡沫经济崩溃、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带来政局变化及各种改革,评价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局限性成为政治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代表性著作有樋渡展洋的《战后日本的市场和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辑出版的《战后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新藤宗幸的《行政指导》、野口悠纪雄的《一九四零年体制》、大山耕辅的《行政指导的政治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原田榊樋的《1970年体制的终结》、内山融的《现代日本的国家与市场》等。与此同时,日本的政策决定过程也是政治学界的研究热点,代表性著作有白鸟令编的《政策决定理论》、饭尾润的《民营化的政治过程:临调型改革的成果及局限性》、中野实的《现代日本的政策过程》、吉田和男的《日本国家预算》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利用经济学原理对日本政治进行分析的视角,另外一个则是利用数学模式或者数理模式分析日本各种政治现象,所谓的“计量政治学”,前者的代表作是井堀利宏和土居丈朗的《日本政治的经济分析》,后者的代表性学者是小林良彰、蒲岛郁夫等。《日本政治的经济分析》一书从政治主体的行动原理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演绎具体政治事例,是用最大效益化作为其分析的理论基础,因而也是一种“合理性选择理论”;小林良彰的《现代日本的选举》、《政治过程的计量分析》、《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日本型民主主义的计量分析》等著作,运用数量化理论及群体分析等多变量公式分析各种政治现象,能够把复杂的政治现象以具体的量化指标表达出来,看似提升了其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但其利用的变量模

式大多建立在假说之上,其随意性使人自然对其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蒲岛郁夫在 2006 年出版的《战后政治的轨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化》^①是一部典型的计量政治分析著作,正如中文版翻译者所指出的那样,蒲岛是日本计量政治学研究的杰出代表,该书是其学术研究之集大成,既有大量的宝贵数据资料,也有许多原创的概念和理论。作者利用许多图标、模式、公式等,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田中统治与中曾根政治的时代”“自民党政治的动摇”“联合执政时期”“自民党体制与小泉政治”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明确指出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支持性参与模式”“牵制性投票者”“共鸣多元主义”等是为更好地理解日本政治而自己提出的模型和概念,同时作者也用实证的方式阐明了投票行为中“争论议题的影响”“业绩投票”“党首投票”“偏好与选项”的存在。作者明确表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选民也决不落后,只要条件具备,争论议题就会极大地左右选举结果,只要政府业绩不佳,选民就会给予“惩罚”,首相的资质要是成问题的话,执政党就要面临艰难的选战。

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学者对计量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质疑,甚至原为蒲岛郁夫学生的菅原琢随后发表对蒲岛书的评论,^②选取该书两章详细论述其分析、解释、议论等,指出存在的方法论及逻辑上的缺陷,同时提出阅读进行计量分析或使用计量分析方法之论文时的注意之处;菅原琢 2009 年出版的《舆论的曲解:自民党为何大败》一书^③中,详细论述了 2005 年大选之后自民党政治家及新闻记者如何“曲解”了舆论以及自民党在 2009 年大选中惨败的必然性,其中利用丰富的资料批评了许多常识性见解,明确指出计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其后,菅原琢又在《美国化的日本政治学:政权交替后的研究界及年轻研究者的问题》^④一文中指出,计量分析的普及、假说检证性论文出现、业绩竞争时代来临等是计量分析方法这种“美国化政治学”流行的背景,但歪曲的竞争社会造成研究的非效率性,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反省;近日,菅原琢发表《政治与

① 蒲岛郁夫:《战后政治的轨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化》,郭定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菅原琢「書評:蒲島郁夫著『戦後政治の軌跡——自民党システムの形成と変容——』」、『日本政治研究(1,2 合併)』,2008 年 1 月,168—192 頁。

③ 菅原琢「世論の曲解——なぜ自民党は大敗したのか」,光文社,2009 年。

④ 菅原琢「『アメリカ化』する日本の政治学——政権交代後の研究業界と若手研究者問題」、『思想地図・5』,NHK 出版,2010 年。

社会脱节的媒体舆论调查》^①一文,指出媒体的舆论调查并非倾听社会的声音,而是按照政界的要求影响国民投票。也就是说,媒体已经失去利用舆论调查批判政府的作用,实际上将议题的选择委托给政界,完全失去了完善选举的功能和作用。

三、以比较政治学为基础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治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有上升的空间,特别是在相关理论与方法上更有强化的必要,不仅缺乏独创性的视角,即使在引用外来理论和方法上也存在尚未完全消化甚至仅为一个术语的现象。这种现象除专业研究者较少的重要因素之外,对日本政治研究也存在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必要。另外,也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及时翻译、评介日本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以便借鉴与学习。本文在此只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阐述中日两国政治发展的定位以及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简单地讲,所谓政治发展是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功能逐渐分化、组织与过程逐渐制度化、政治主体逐渐多元化、决策程序逐渐民主化、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等。实际上,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亚这些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并非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的政治发展理论所说的单线性,而是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权威主义、发展主义、精英主义、市民主义等政治体制。

在战后初期的东亚地区,虽然存在着时间上差别,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而且均采取了民主主义式的政治体制,例如宪法、议会、内阁、司法、政党、选举等等。但无论是在采用干预市场型的国家,还是在政府计划型的国家,其政治发展均不顺利。在干预市场型国家中,民主的体制反而带来政治的不稳定,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政局的混乱,结果为更加独裁型的政治体制所代替;而在政府计划型国家中,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虽然在短时期内保持了非民主主体制下的政治稳定,但过度强化意识形态的行为导致短缺经济的出现,最终也不得不走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归纳这一政治体制的特征就

^① 菅原琢「政治と社会を繋がないマス・メディアの世論調査」,『放送メディア研究13』,NHK出版、2016年。

是：强有力的权威性政治人物的存在且国家权力向个人倾斜、有民主宪法而无民主政治但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有朝鲜的金日成、韩国的李承晚、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马来西亚的拉赫曼、泰国的披汶、缅甸的奈温、菲律宾的罗哈斯等。但是，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初步形成，为其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范畴，这对从未形成政治实体的海岛地区诸国来说尤为重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成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实际上，权威性政治人物最关心的课题是政治整合、民族国家，从稳定政权的立场发展经济，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措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因而对经济发展并不十分重视，往往因其他目标而忽略。也就是说，虽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战后初期东亚各国均施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当时的权威主义领导人并没有将发展经济作为最重要的使命来对待。比起经济发展来，政权的稳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东亚各国在战后初期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从当时的政治含义以及政权稳定的角度讲是必然的和合理的措施，因为新生的国家政权建立国营企业以对抗外国资本的行为，能够引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但长久地执行这一政策势必带来成本上升、负债累累甚至经济危机等弊端，失去国民的支持，权威主义政权成为社会各阶层批判的对象，为发展主义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具体地说，进口替代工业化之所以失败，从经济角度讲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通过剥夺农民的方式进行工业建设，势必造成国内市场的狭窄。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难以较大规模地购买工业产品；第二，当时的工业化多为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工业，难以吸收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农民的贫困；第三，技术水平较低，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较差，成本较高，难以打开市场。

所谓发展主义政治是指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也有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威权主义”“独裁开发体制”等。从起始的时间上看，迁台后的国民党政权、1957年成立的沙立政权、1961年成立的朴正熙政权、1965年新马分离后的李光耀政权、1966年建立的苏哈托政权、1970年建立的拉扎克政权、1972年实施军管的马科斯政权、1977年邓小平的重新复出执掌最高权力、1986年阮文灵当选为越南总书记等事件分别标志着台湾地区、泰国、韩国、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越南等进入发展主义政治阶段。这一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以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为中心,议会或者政党政治变成民主主义的一种象征,军队或独裁性政党与技术性行政官僚成为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政治主体,在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基础上出现了被誉为“东亚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局面。尽管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下,存在着党政不分、军政不分、政企不分、各领域精英相互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弊端,遂造成市场经济不完善、贪污腐败盛行、金融体制漏洞百出、贫富差距过大等,不仅影响到经济到达一定水平后的稳定持续增长,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很容易受到外来资本的冲击,1997年东亚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东亚地区的历史背景来看,尽管各国(地区)存在着程度上的些许差异,但在传统文化中权威主义、集团主义色彩较浓的特征上具有共性,同时无论在经济发展的方面,还是在自由平等意识以及民主政治实践的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即使在摆脱发展主义的政治体制后,从属性较强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仍需要在国家(地区)的组织和主导下,进行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行军,从而在政治体制上呈现出浓厚的精英多元色彩。战后的日本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东亚地区政治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前的日本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权威主义、发展主义阶段,占领时期改革使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所谓的“55年体制”。虽然在世纪之交前后,韩国与台湾地区出现了政党间权力交替的政治民主化现象,但正如地方相互对立的“地域政治”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政治”所体现的那样,属于尚未稳定的精英多元主义政治体制。

需要补充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多元化,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势力多元化。具体地说,那些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为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组织起来,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并通过投票选举、提供政治资金、直接参与、个人联系、诉诸舆论、游行示威等形式表达其利益要求,同时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例如农业团体、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经营者团体、教师协会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利益相互之间带有某种冲突性,例如市民团体与农民团体、流通业团体与消费者团体、经营者协会与工会组织、企业团体与环境保护组织等。因此,各自通过相关的渠道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或者直接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立法机构,参与制定保护和扩大自己利益的相关法律。这样一来,多元化趋势便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利益集团的增加与城市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有关。所谓城市中间阶层是指那些即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也不是纯粹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是较为富裕的各种企事业管理人员或从事特殊职业的技术人员,其中又分为新中间阶层和旧中间阶层。新中间阶层是那些从事律师及医师等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即所谓的白领阶层或金领阶层;旧中间阶层是指那些经营较小规模商店、饮食店、手工业的个体经营者。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所做的调查结果来看,东亚地区中间阶层的共同特征具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经济上的相对成功者,即收入是所在国的中上收入群体,具有购买最新消费资料的能力并拥有最新消费资料;第二,充分肯定自己的能力与业绩,通常选择“收入高”“能发挥能力”的工作,其回答比例大大超过诸如“工作较轻”“工作时间较短”“工作环境较为轻松”等选择;第三,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及政治参与意识较强,而且对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十分关心,对现存政治体制亦持批判态度,因而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同时由于他们是高速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因而肯定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希望社会体制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间阶层积极组成自己的团体,其原因一方面行政体制的日益完善,另一方面日益独立的个人通过各种团体与国家保持关系。特别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主导下得到急剧扩张后,共同体成员的生产、生活过程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人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影响国家的决策过程,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日趋加强。更为重要的是,由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组成的社会团体与传统的社会团体不同,也就是这些新兴团体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活动,积极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强调政权组成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因而对政治过程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

市民主义政治体制带有以下诸特征,即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在地方自治体、民间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积极参与下,民间企业、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市民团体甚至个人,不仅其政治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较强,而且逐渐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

目前东亚地区正处在新一轮的政治变革过程中,政治发展层次最高的日本处在从精英多元主义政治体制向市民多元主义政治体制过渡时期,过去那种政府主导下的“利益诱导政治结构”造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经济的持续衰退,在野党的多党化、软化也是这种政治结构产生诸多弊端的重要原因。当然,封闭的国内市场以及行政指导下的第三产业难以适应越来越明显的全

球化趋势构成改革的体制性原因。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以变革选举制度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四法案、1996年开始的以行政改革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教育等六大改革、1999年实行的以废除政府委员国会答辩制为中心的日本国会制度改革等措施,其目的就是通过实施比例区小选区并立制,形成两大政党竞争并主要以政策吸引选民的政治结构。与此同时,最终将政治权力和责任逐渐“从政府转移到民间”“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官僚转移到议员”,确立政党在决策过程乃至政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削弱行政机构的规模和权限,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市民团体乃至个体国民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活力。但目前日本经济处在持续低迷状态、以政治家与官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权威主义性较强的传统文化、知识经济领域的严重滞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人口结构等,均使改革与过渡伴有巨大的困难。

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设进入精英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以及新的政治体制。在已经超越政治民主化客观指标的新加坡,既无农业亦无地方政府的城市国家特征,使其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实质仍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人民行动党控制这个城市国家的能力尚未受到挑战,其立法、行政、司法亦未实现功能的结构化及专业化,政治精英的多元化体制也没有形成,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及政治参与的成熟化仍然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较小的城市国家规模、权威政治人物拥有的强大影响力、权威主义式的儒家文化色彩均使得改变导致经济现代化较为成功的政治体制十分困难。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政府在继续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应在政治领域采取完善政党政治、军队退出政治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确立政治结构功能化以及多元化等改革措施。在一些仍处在权威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通过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推动政治发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由此可见,首先通过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阐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地区)处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后才能利用特定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政治体制或政治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正因如此,理论与方法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必不可少工具。